

壹、緒論

成語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比喻語言 (figurative language) 之一，在文本閱讀和書寫表達上，成語的使用和理解，使得語言文字的溝通顯得生動有力。例如，百年結婚潮，我們在恭賀新人的卡片上寫著：「天作之合」；選舉喧嘩，報紙的標題以選情「撲朔迷離」傳達選戰的氣氛；歲末年終，友人致信相互鼓勵「否極泰來」。長於書面文字表達的作家們，也沒忘記成語，例如，張系國的《棋王》中，用到的成語數量，以四字成語來計算，有284個（引自陳立元、陳怡靜，2003）。成語在人類的閱讀活動、訊息傳遞和人際語言文字溝通中，充滿趣味和生命力。

透過認識、理解成語詞的比喻意義，成語讀者可以將文字從單一字元的層次，推升到閱讀理解的層次，發揮成語藉此喻彼的妙用。因此，成語的理解不僅是語文能力的展現，也是人類思考與認知歷程的結果（Gibbs, 1994; Nippold, 2007）。當中文成語頻繁地出現於文本讀寫和日常溝通中，並且能夠有效的協助人們達成溝通意圖，成語的理解歷程便成爲一個不容忽視的認知識題。

本研究從這樣的角度出發，觀察中文成語，發現有趣的現象是，成語的意義涉及了兩個層面：字面意義和比喻

意義 (literal meaning and figurative meaning)。以兩個中文成語爲例：一目十行（字面意義：用眼睛看書，一次可以看十行；比喻意義：形容閱讀速度的快速）、囫圇吞棗（字面意義：吃棗子時不加咀嚼，把整個都吞下去；比喻意義：比喻理解事物籠統含糊）。這兩個成語詞整體所要表達的比喻意義，和成語詞內部的每個字元代表的字面意義，兩者之間的關係相當巧妙。如果我們假定，當成語的閱讀者看到一個成語詞時，需要經過某種認知歷程，從文字的表面意義，進入到理解成語的比喻語言意義。那麼，在這個歷程中，有哪些關鍵因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呢？

在過去，很多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相信成語是「凍結了生命的譬喻詞」 (dead metaphor)，也就是成語的比喻意義無法透過成語內部語意的分析而獲得 (Gibbs, 1992; Gibbs, Bogdanovich, Sykes, & Barr, 1997; Nayak, 1989)。讀者要了解這樣的成語，別無他法，只能將成語的字串和被指定的比喻意義，加以連結且記憶起來。這樣的假定所採取的立場是：「成語的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之間無關係存在」。然而，這個強烈的立場，在當代的研究中備受質疑。Nunberg在1977年提出「成語可分解性假設」 (the idiom decomposition hypothesis) (Nunberg, Sag, & Wasow, 1994)，強調要探究成語的理解歷程，

就必須先放棄傳統上將成語視為同質性的、不能分解的整體字串之觀點。在後續Gibbs與Nayak（1989）的研究中，採取了Nunberg提出的連續性光譜概念，將成語的「可分析性」程度，界定為「成語的內在個別成分對於成語整體比喻意義的貢獻程度」，根據這個界定，可將成語分成不同可分析程度的群體，而且研究也發現，不同可分析程度影響了成語理解的程度。

回到中文成語來看，陶原珂（2002）指出，中文成語的表層字面意義具有形象比喻作用，可以使人產生聯想，讓中文成語的理解呈現出釋義擴展的歷程。在西方語言的研究中，Boers與Demecheleer（2001）及Nippold與Duthie（2003）則指出，當成語具備較高的可想像性（imageability），其語意透明度也會隨之提高，在理解的過程中，比較容易推測出成語的比喻意義。因此，在理解上，針對成語內部組成成分進行較多的語意分析和推論，可能是中文成語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。

從上述學者的說法中，本研究推想，從可分析性的角度來探討中文成語的認知理解歷程，應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性研究。這樣的推測，在新進的一些研究中也初步看到了一些證據。例如，在Zhang、Yang、Gu與Ji（2013）的研究中，探討中文讀者在閱讀不同組成性程度的成語時，所誘發的腦電波電位變化

情形。研究結果顯示，N250和N400的波幅變化在高和低組成性的成語之間達到顯著差異，高組成性成語的波幅明顯小於低組成性的成語。由於N250和N400的波幅愈大，代表讀者必須付出愈多的認知努力，根據實驗結果，Zhang等人認為，成語的組成性特質在成語理解中產生作用，高組成性成語需要的心理資源較少，而低組成性成語則需要較多的努力。此外，在梁雲霞與鄭雅丰（2012）和Lin（2009）的研究中也發現，中文成語內部組成成分的可分析性對於成語理解表現具有影響力，當成語的可分析性愈高，中文讀者愈容易理解該成語的意義。

上述的研究固然對於成語可分析性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證據，然而，這些研究都是以成語單獨出現的方式進行研究。如果讀者是在句子或文本中讀到成語，也就是，成語處於某種語境中時，可分析性是否仍然有所作用？換句話說，基於先前研究對於中文成語可分析性的發現，本研究想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：可分析性和語境之間的關係為何？是雙重並進？互有消長？還是其他的競合型態？

從西方的文獻中可知，Cacciari與Levorato在1990年代提出了「整體精緻化模式」（Global Elaboration Model, GEM），用以解釋成語理解的習得歷程。Levorato與Cacciari（1995, 1999）